

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对定居意愿的影响及群体差异

——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分析

苏群, 李潇

(南京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5)

摘要: 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2014 年数据, 探析了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对其定居意愿的影响及群体差异, 结果表明: 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水平较低, 仅为 0.347, 也只有 13.27% 的农民工愿意定居城镇; 其中, 生存能力和发展能力对农民工城镇定居意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适应能力影响不显著; 就群体差异而言, 生存能力与发展能力对新一代农民工和异地农民工定居意愿影响更甚, 对老一代农民工与本地农民工影响较小。

关键词: 农民工; 市民化能力; 定居意愿; 群体差异

中图分类号: F323.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19)05-0055-07

Impact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ability to localize their residency in urban areas on their settlement willingness and group differences based on CLDS

SU Qun, LI Xiao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China Labor Force Dynamic Survey (CLDS) data,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impact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ability to localize their residency in urban areas on their settlement willingness and group differences.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rural migrant workers' ability to localize in the urban areas is as low as 0.347, and only 13.27% of the rural migrant workers are willing to settle in urban areas. Besides, survival ability and development ability exert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ir settlement willingness, but the effect of adaptive ability is inconspicuous. Moreover, in terms of group differences, survival ability and development ability have a greater effect on the settlement willingness of the new generation and off-site rural migrant workers than those old generation and local ones.

Keywords: rural migrant workers; the ability to localize their residency in urban areas; settlement willingness; group differences

一、问题的提出

农民工是中国社会经济转型和体制转轨时期产生的一个特殊且引起广泛关注的过渡性群体^[1]。随着政策倾向的转变, 大批农民进城务工并在城镇定居, 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建设^[2]。近年来, 中国城镇化建设一直备受关注。一方面,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表明, 2018 年城镇化率已达

59.58%, 十分接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制定的60%城镇化率目标; 另一方面, 多数农民工仍以“候鸟式”的迁移方式在城市短暂居留, 无法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 逐渐成为城市的“边缘人”^[3]。目前农民工城镇定居意愿不高, 市民化能力也不足^[4,5], 严重制约了城镇化进程, 不利于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学界对农民工城镇定居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一系列研究。蔡昉研究认为, 由于城乡分割的二代户籍制度, 农业转移人口无法获得与城市户籍人口相同的福利待遇, 严重削弱了他们的定居意愿^[6]。随着城镇化建设的大力推进, 学界更多地关注于农

收稿日期: 2019-10-15

基金项目: 江苏省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PAPD)

作者简介: 苏群(1968—), 女, 宁夏银川人,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民工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社会经济状况以及市民化能力等主观层面的影响因素。冷萱、王雨林运用 CLDS 数据分析得出,年龄会抑制农民工城镇定居意愿,降低其市民化倾向^[7];钱文荣、李宝值通过对长三角 16 个城市的调查,认为受教育程度会提高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进而提升其定居意愿^[8];李珍珍、陈琳实证研究认为,已婚且与配偶在同一城市的农民工定居意愿要显著高于未婚和已婚与配偶不在同一城市的样本^[9]。孟凡礼等基于 CHIP2008 年的数据得出,家庭年收入会显著提高农民工城镇定居意愿^[10];汪润泉在控制模型内生性后的研究认为,子女教育期望会显著提升农民工城镇定居意愿,并有效缓解城市排斥对农民工定居意愿的弱化作用^[11];刘华、苏群针对江苏女性农民工的研究认为家庭土地拥有量越多城镇定居意愿越低^[12]。李树茁、夏怡然等研究得出,融入城市社会的程度会影响农民工城镇定居意愿^[13,14]。聂伟、风笑天对长三角和珠三角农民工的调查认为工作保障的获得和工作满意度的提升都会显著提高农民工的城镇定居意愿^[15]。叶俊焘研究认为,较低的市民化能力抑制了农民工的城镇定居意愿^[16]。

既有文献梳理表明,学界对影响农民工城镇定居意愿的影响因素虽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但对市民化能力影响农民工城镇定居意愿及其群体差异缺乏较为深入的研究。为此,笔者拟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2014 年的数据,对农民工市民化能力进行三维度区分的基础上,分析其对农民工定居意愿的影响与群体差异,为推动农业转移人口长期定居城镇和合理制定下一阶段城镇化建设方案提供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与国际人口迁移不同,中国农民工的迁移往往是遵循先实现就业非农化,再实现定居地或户籍城镇化的路径。农民工需要具备在城市生存的能力,才能从农村转向城市;只有进一步适应城市生活,农民工才愿意在城市长期生活;而只有具备在城市长期发展的机会与能力,农民工才能实现定居。因此,本研究参考 Liang 的市民化能力划分^[17],将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分为生存能力、适应能力和发展能力三个方面。能力能够转化并形成人们的福利,不

同能力的个体其得到的福利水平也各不相同^[18]。从农民工城镇定居行为的实现过程来说,能力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农民工需求的实现,会带来个体效用和福利水平的提升,最终提高农民工的城镇定居意愿。农民工从农业进入非农行业的初衷是为了获得更高的收入或是更好的发展机会^[19],因此生存能力和发展能力的提升将正向激励或强化农民工城镇定居意愿。适应能力能够反映农民工的社会参与和归属感情况,较高的适应能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其他能力不足产生的负面影响,强化农民工的城镇定居意愿。据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₁: 农民工的市民化能力越高,其城镇定居意愿越高。

目前中国农民工群体内部出现了以代际和就业地点为标志的群体划分。王春光以 1980 年为界限,将农民工分为新一代和老一代,学界对这一分类标准也都达成了共识^[20]。李练军基于“三环节”理论研究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水平明显偏低^[21]。钱文荣、李宝值基于代际差异的研究认为,新、老两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不尽相同,其定居意愿也存在显著差异^[8]。另外,在本地或异地工作的农民工,其生活环境、工作机会和城市适应性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最终分化成两个不同的群体,其市民化能力与城镇定居意愿势必也会产生差异。越是在城市工作的农民工其工作机会和城市适应力越强,但是生活成本上升和城市歧视带来的压力也越大,而本地就业的农民工则与之相反^[5,14,19]。据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₂: 新、老两代农民工、本地和异地农民工的市民化能力与定居意愿存在差异,且市民化能力对其定居意愿的影响也不同。

三、模型与变量选择

1. 模型选择

本文选用了基于样本分布的隶属函数形式来测算农民工市民化能力,该函数形式可以避免线性形式隶属函数对数据的要求过于严格,也可以避免梯形和 S 型隶属函数对临界点要求而引起的主观问题^[22]。对应指标类型具体的隶属函数有以下三种表达:

$$\mu(x_{ij}) = \begin{cases} 0, & x_{ij} = 0 \\ 1, & x_{ij} = 1 \end{cases} \quad (1)$$

$$\mu(x_{ij}) = \begin{cases} 0, x_{ij} \leq x_{ij}^{\min} \\ \frac{x_{ij} - x_{ij}^{\min}}{x_{ij}^{\max} - x_{ij}^{\min}}, x_{ij}^{\min} < x_{ij} < x_{ij}^{\max} \\ 1, x_{ij} \geq x_{ij}^{\max} \end{cases} \quad (2)$$

$$\mu(x_{ij}) = \begin{cases} 0, x_{ij} \geq x_{ij}^{\max} \\ \frac{x_{ij}^{\max} - x_{ij}}{x_{ij}^{\max} - x_{ij}^{\min}}, x_{ij}^{\min} < x_{ij} < x_{ij}^{\max} \\ 1, x_{ij} \leq x_{ij}^{\min} \end{cases} \quad (3)$$

其中, $\mu(x_{ij})$ 是农民工各维度能力子指标的数值, 也即隶属度, 取值是 [0, 1]。式 (1) 表示当指标是虚拟二分变量时能力指标的计算, 式 (2) 和式 (3) 分别表示子指标为连续变量或虚拟定性变量时指标与能力呈正向关系和负向关系时的隶属度计算公式。将各子指标的能力数值进行计算后, 需要确定加总方式来获取各维度能力水平与总的市民化能力水平。常用的加总方式有四种, 分别是标准的交集运算、弱交集运算、简单算术平均和加权算术平均。国内学者最常用的是加权算术平均法, 该方法给予隶属度较小的变量较大权重, 更关注获得程度较低的子指标和功能^[23]。其次就是简单算术平均法, 该方法默认各功能或子指标重要程度近似, 好的维度也可以补偿差的维度。因为市民化能力三个维度 8 个子指标的重要程度难以确定, 从现实情况来看某一维度能力或子指标较好是会对其他维度产生补偿作用的。故根据本研究的实际情况, 最终选定的加总方式为简单算术平均法。简单算术平均的计算公式如下:

$$U = \sum_{i=1, j=1}^{i, j} \mu(x_{ij}) \cdot \frac{1}{i} \cdot \frac{1}{j} \quad (4)$$

通过式 (4) 计算出来的隶属度值 U 取值区间为 [0, 1], 越接近 0 表示能力水平越低, 反之则代表能力水平越高。且参照 Sen 的观点, 隶属度值在 0.4 ~ 0.6 为中间水平, 低于 0.4 和高于 0.6 分别代表低水平和高水平。

此处农民工城镇定居意愿为 Y , 是一个二元变量, 市民化能力为 X , 由生存能力 (X_1)、适应能力 (X_2) 和发展能力 (X_3) 三部分构成, 故而:

$$Y = f(X) = f_x(X_1, X_2, X_3) \quad (5)$$

因此, 本研究构建的二元 Logit 模型表达式如下:

$$\ln\left(\frac{p}{1-p}\right) = \alpha + \beta_0 X_0 + \beta_1 X_1 + \beta_2 X_2 + \beta_3 X_3 + \varepsilon \quad (6)$$

(6) 式中, p 代表农民工愿意定居城镇的概率, $1-p$ 表示不愿意定居城镇的概率。 X_0 代表控制变量, $X_1 \sim X_3$ 的定义同上, ε 表示误差项, $\beta_0 \sim \beta_3$ 是模型的待估系数, 也是本研究关注的重点。

2. 变量选择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是城镇定居意愿, 对应问卷中的“未来 5 年, 你是否计划到城镇定居?”问题, 对应回答有“是、否和已经在城镇定居”, 根据研究需要删除了已经在城镇定居的样本。由于能力维度难以直接观测, 在进行解释变量选择时, 参考阿马蒂亚·森的理论, 用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担保和防护型保障四方面的指标对应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的三个维度 8 个变量 (鉴于中国农民工实际的政治参与情况, 略去了政治自由指标)^[24]。经济条件对应农民工生存能力维度。透明性担保对应农民工适应能力维度, 主要包括本地关系亲密的人数和对本社区居民的信任程度。社会机会和防护型保障对应农民工发展能力维度, 包括工作职级和专业或职业资格证书数量以及是否有城镇类医疗保障和是否有城镇类养老保障。在运用主成分法对拟采用的变量进行因子分析后, 将市民化能力三个维度的指标进行科学划分。因子分析的 KMO 抽样精确度指标为 0.6104, 说明样本可以使用因子分析法。依据特征值和碎石图保留了三个共性因子, 使用方差极大化的正交旋转后最终得到三组核心变量。

其中生存能力维度有工作年收入的的对数和家庭年收入的的对数, 取对数是为了消除部分异方差带来的估计误差。鉴于本研究讨论的农民工工作类型包括雇员、自雇和雇主, 因此农民工个人年工作收入分别对应个人问卷中“您 2013 年的工资性收入有多少 (元)?”和“您 2013 年经营性收入是多少 (元)?”这两个问题; 而家庭年收入的讨论则是基于家庭问卷中“2013 年全年, 您家的总收入大概是多少?”这一问题的回答。

适应能力维度选择了本地关系亲密的人数和对本社区居民的信任程度两个变量, 前者对应问卷中“在本地, 您有多少个关系密切、可以得到他们支持和帮助的朋友/熟人?”, 后者对应问卷中“您对本社区 (村) 的邻里、街坊及其他居民信任程度

如何?”这一问题,对应回答可视为三级分类变量。

发展能力包含是否有城镇类医疗保障、是否有城镇类养老保障、工作职级和专业或职业资格证书数量。其中城镇类医疗保障的统计只考虑除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之外的医疗保险的有无,城镇类养老保障的统计也只考虑除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外的养老保障的有无。因为样本工作类型的差异,因此工作职级是讨论个体是否有直接下属或员工的二元变量,默认自雇农民工工作职级为0,雇主农民工工作职级为1。专业或职业资格证书的数量是根据问卷中“您从2012年7月到现在这段时间内获得过的专业(包括职业资格)技术资格证书(执业资格)一共有多少个?”来统计的。控制变量主要有农民工个人的年龄、受教育年限、婚姻状况和工作地点四个变量。

四、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自“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以下简称CLDS2014)。该调查于2011年由中山大学开展,采用多阶段、多层次与劳动力规模成比例的概率抽样方法,分社区、家庭和劳动力个体三个层次,涉及人口、经济、社会、心理、健康等多种信息。调查范围覆盖了全国29个省市(除港澳台、西藏和海南外),对东中西部省份均有涉及,调查对象主要是16~64岁的劳动力,具有较好的样本代表性和详细的劳动力个体信息。

其中CLDS2014调查了全国401个村居,14214户家庭共计23594位劳动力。本研究将农民工定义为“具有农业户籍身份,从事非农工作并取得工资性或经营性收入的劳动者,包括本地非农就业农民和进城务工农民”。采用此定义的原因主要是本文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希望能够探讨农民工整体定居意愿与市民化能力状况,所以将研究对象从进城务工人员进一步扩展到了全体非农就业农民工。通过CLDS2014问卷中“您目前的户口性质”、“您是否有过工作经历”和“您工作的职业类型”这三个问题筛选出所需要的样本。

2. 样本特征

在最终得到的3286个样本中,有定居意愿的个体共436个,占样本的13.27%,低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笔者认为这一方面是因为问卷中对农民工定居意愿的考察设定了“未来5年”的年限,另一方面是本研究没有将年龄64岁以上的老人删除,而年龄对定居意愿的负向影响已得到证实^[19]。为了考察样本的代表性问题,有必要仔细解释这一变量。问卷调查年份即2013年中国按常住人口统计的城镇化率为53.73%,假设人口分布情况不变,若按照问卷结果估算未来5年中国城镇化率约提高6.14%,而截至2018年底城镇化率水平是59.58%,这说明问卷结果比较符合现实情况。

在用隶属函数计算和简单算术平均加总后得到的各维度能力水平与总的市民化能力水平见表1。按照群体差异将农民工分为新、老两代农民工与本地和异地农民工两类,并讨论了总样本的市民化能力水平。统计结果表明,农民工总体市民化能力水平不高,仅为0.347,处于中间偏低水平;生存能力、适应能力和发展能力水平依次降低。从代际差异看,新一代农民工生存能力与发展能力分别高出老一代农民工2.44%和22.83%,适应能力低于老一代农民工10.21%。从工作地点看,异地农民工市民化能力高出本地农民工2.91%,其中发展能力更是高出47.67%。这表明不同工作地点下农民工发展情况存在很大差异,异地农民工获得的发展机会显著高于本地农民工。表1中也列出了农民工定居意愿均值,可以看出新一代农民工定居意愿显著高于老一代农民工,但是二者市民化能力差值不大,反映能力与意愿匹配过程中的错位现象。异地农民工城镇定居意愿也显著高出本地农民工123.96%,远大于二者能力水平2.91%的差值。统计分析不难看出,目前农民工整体市民化存在能力匮乏和定居意愿较低的现状,但是难以直接看出能力对意愿的影响情况。为了进一步分析二者关系,下文将利用二元Logit模型进行分析,并讨论群体差异下城镇定居意愿的异同。

表 1 农民工市民化能力与定居意愿结果

能力维度	新一代		老一代		本地农民工		异地农民工		总样本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生存能力	0.545	0.078	0.532	0.083	0.535	0.083	0.539	0.077	0.536	0.081
适应能力	0.378	0.164	0.421	0.148	0.412	0.152	0.397	0.158	0.407	0.154
发展能力	0.113	0.201	0.092	0.175	0.086	0.169	0.127	0.212	0.098	0.184
市民化能力	0.345	0.094	0.348	0.085	0.344	0.084	0.354	0.097	0.347	0.088
定居意愿	0.243	0.429	0.082	0.274	0.096	0.295	0.215	0.411	0.133	0.339
观测值个数	1035		2251		2282		1004		3286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1. 能力对意愿的影响分析

表 2 给出了在只含控制变量的二元 logit 模型中依次加入生存能力、适应能力、发展能力和三者均加入的回归结果。从模型结果中可以看出, 年龄、受教育年限和工作地点都对农民工的城镇定居意愿产生了显著影响。模型四的回归结果表明年龄每增加一岁, 愿意定居城镇的可能性下降 0.54%; 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 愿意定居城镇的可能性增加 0.44%。从能力变量来看, 生存能力每提高一个单位, 农民工愿意定居城镇的可能性将显著提升 31%; 发

展能力提升一个单位, 农民工愿意定居城镇的可能性会显著提高 14%; 而适应能力对定居意愿影响并不显著, 且作用系数也仅为 2.2%。笔者认为这反映出现阶段农民工整体收入不高, 生活成本较大, 因此生存能力的提升较为迫切。同时农民工群体对工作机会和社会保障的需求增多, 稳定的工作和有保障的生活能够显著提升其定居意愿。在生存能力和发展能力都较低时, 适应能力就不再是农民工所依赖的城镇定居关键要素, 故而影响并不显著。该模型的回归结果证实了上文提出的 H₁, 证实了市民化能力提升会正向促进农民工城镇定居意愿。

表 2 能力与意愿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被解释变量 (是否愿意定居城镇)							
	边际影响							
年龄	-0.0051***	(-8.15)	-0.0053***	(-8.35)	-0.0054***	(-8.68)	-0.0054***	(-8.46)
受教育年限	0.0073***	(3.86)	0.0093***	(4.99)	0.0055***	(2.90)	0.0044**	(2.30)
婚姻状况	0.0045	(0.27)	0.014	(0.87)	0.010	(0.63)	0.0036	(0.22)
工作地点	0.074***	(6.45)	0.072***	(6.22)	0.064***	(5.55)	0.067***	(5.83)
生存能力	0.40***	(5.38)	/	/	/	/	0.31***	(4.18)
适应能力	/	/	0.018	(0.49)	/	/	0.022	(0.61)
发展能力	/	/	/	/	0.17***	(6.29)	0.14***	(5.20)
Wald 卡方检验	277.13***		248.27***		284.90***		302.94***	
观测值个数	3286							

注: ***, ** 和 * 分别表示 1%、5% 和 10% 的显著水平。

2. 群体差异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不同农民工群体市民化能力对定居意愿影响的异同, 运用 Logit 模型分样本回归, 结果见表 3。从不同代际群体回归结果来看, 年龄对老一代农民工定居意愿的负向影响显著, 但是对新一代农民工不显著, 这表明年龄更多限制了老一代农民工城镇定居意愿, 年龄越大其身体素质越差, 在城镇定居的意愿越低。受教育年限对新、老两代农

民工定居意愿影响都为正, 但是不显著, 这与样本农民工整体受教育年限较低且分布集中多为初中学历有关。越是已婚的农民工其城镇定居意愿越低, 表明农民工在定居城镇决策过程中, 会受到来自伴侣或家人的影响。而异地工作会使农民工城镇定居意愿显著提升, 且对新一代农民工的影响更大。

生存能力与发展能力对新、老两代农民工都产生了显著影响, 但是对新一代农民工的影响程度更

大。其中生存能力每提高一个单位,将使新一代农民工愿意定居城镇可能性提高69%,使老一代农民工愿意定居城镇可能性提高15%。这与已有研究揭示的新老一代农民工非农就业动机不同有关,即新一代农民工因为个人对城市的向往而从事非农行业,而老一代农民工多是为了改善生计和家庭生活条件。因此在生存能力得到提升后,新一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定居城镇而非回流农村。发展能力每提升一个单位,分别使新一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愿意定居城镇可能性提高25%和8.6%,也即医疗与养老保障的获得、职业证书的增加和工作职级的提升对于新一代农民工来说更能成为他们进入和定居城镇的动力。适应能力对新一代农民工产生了负向影响,尽管并不显著。这表明对新一代农民工来说,传统的邻里社会信任已经不再成为影响他们城镇定居意愿的重要因素。

不同工作地点的农民工群体中,本地农民工定居意愿受年龄的负向影响更甚,年龄每增加一岁其

愿意定居城镇可能性降低3.4%,异地农民工仅降低1.1%。受教育年限对本地农民工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对异地工作农民工的影响并不显著。这表明对于在本地工作的农民工群体来说,他们更加依赖人力资本才能去从事非农行业劳动,而这一人力资本提升会提高他们的城镇定居意愿。对于异地工作的农民工来说,生存能力每提高一个单位其愿意定居城镇可能性提高62%,远高出本地农民工20%的影响系数。这既能反映出本地和异地农民工生存条件的差异,也表明足够大的经济拉力才会促使农民工异地就业与定居。因此异地农民工定居的实现更加依赖经济条件的改善。发展能力每提升一个单位将使异地农民工愿意定居城镇可能性提升22%,使本地农民工提升9.7%。这反映出异地农民工更加追求防护型保障获得和社会机会增加,这方面的改善将增加他们长期定居城镇的能力,进而显著提高其愿意定居城镇的可能性。上述结果验证了H₂。

表3 群体差异性分析结果

变量	新一代农民工		老一代农民工		本地工作农民工		异地工作农民工	
	被解释变量(是否愿意定居城镇)							
	边际影响							
年龄	-0.0025	(-0.69)	-0.0040 ^{***}	(-4.64)	-0.0034 ^{***}	(-5.34)	-0.011 ^{***}	(-7.11)
受教育年限	0.0049	(1.03)	0.0032 [*]	(1.71)	0.0041 ^{**}	(1.96)	0.0046	(1.11)
婚姻状况	-0.019	(-0.56)	-0.0041	(-0.14)	-0.016	(-0.86)	0.045	(1.34)
工作地点	0.14 ^{***}	(5.37)	0.033 ^{***}	(2.78)	/		/	
生存能力	0.69 ^{***}	(3.97)	0.15 ^{**}	(2.00)	0.20 ^{**}	(2.57)	0.62 ^{***}	(3.65)
适应能力	-0.024	(-0.31)	0.052	(1.30)	0.011	(0.27)	0.049	(0.64)
发展能力	0.25 ^{***}	(4.08)	0.086 ^{***}	(3.08)	0.097 ^{***}	(3.07)	0.22 ^{***}	(4.04)
Wald 卡方检验	88.72 ^{***}		75.00 ^{***}		100.39 ^{***}		130.76 ^{***}	
观测值个数	1035		2251		2282		1004	

注:***、**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水平。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研究运用CLDS2014年的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对城镇定居意愿的影响及群体差异。主要结论如下:第一,农民工目前处于低能力、低定居意愿阶段,市民化能力仅0.347,愿意定居城镇的样本仅13.27%;第二,生存能力、适应能力和发展能力都对农民工城镇定居意愿有正向影响,且生存能力和发展能力影响显著;第三,群体差异下,新一代农民工与异地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水平较高,其定居意愿受生存能力和发展能力影响

更甚。

基于以上结论,笔者认为在提高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提升其定居意愿并最终实现稳定可持续定居过程中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政府部门要尽快剥离户籍关联福利,将农民工纳入城市公共服务体系,让农民工在城市也同等享有住房、医疗、教育和养老等方面的社会保障,提升其生存能力;第二,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要定期为农民工提供免费职业培训、技能培训等,从人力资本入手提高其在城市长期发展的竞争力;第三,要积极创造多种形式的公共活动吸引农民工参与,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

城市, 扩大其社会网络, 提高他们的适应能力。

参考文献:

- [1] 刘传江, 徐建玲. 第二代农民工及其市民化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7(1): 6-10.
- [2] 蔡昉. 农业劳动力转移潜力耗尽了么?[J]. 中国农村经济, 2018(9): 2-13.
- [3] 蔡昉. 宏观经济政策如何促进更多更好就业?——问题、证据和政策选择[J]. 劳动经济研究, 2015, 3(3): 3-31.
- [4] 毛丰付, 卢晓燕, 白云浩. 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研究述评[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17(5): 21-28.
- [5] 周蕾, 谢勇, 李放. 农民工城镇化的分层路径: 基于意愿与能力匹配的研究[J]. 中国农村经济, 2012(9): 50-60.
- [6] 蔡昉. 以农民工市民化推进城镇化[J]. 经济研究, 2013, 48(3): 6-8.
- [7] 冷萱, 王雨林. 农民工流动经历与市民化倾向——来自 CLDS 的证据[J]. 调研世界, 2017(10): 42-48.
- [8] 钱文荣, 李宝值. 初表达成度、公平感知度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基于长江三角洲 16 城市的调研数据[J]. 管理世界, 2013(9): 89-101.
- [9] 李珍珍, 陈琳. 农民工留城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 南方经济, 2010(5): 3-10.
- [10] 孟凡礼, 谢勇, 赵霞. 收入水平、收入感知与农民工的留城意愿[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15(6): 42-50; 137.
- [11] 汪润泉. 子女教育期望与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基于全国 7 个城市调查数据[J]. 农业技术经济, 2016(3): 75-84.
- [12] 刘华, 苏群. 农村女性劳动力留城意愿实证分析——以江苏省为例[J]. 中国农村经济, 2005(9): 42-47.
- [13] 李树茁, 王维博, 悦中山. 自雇与受雇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差异研究[J]. 人口与经济, 2014(2): 12-21.
- [14] 夏怡然. 农民工定居地选择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温州的调查[J]. 中国农村经济, 2010(3): 35-44.
- [15] 聂伟, 风笑天. 就业质量、社会交往与农民工入户意愿——基于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农民工调查[J]. 农业经济问题, 2016, 37(6): 34-42+111.
- [16] 叶俊焘. 转型时期农民工留城意愿之再审视——一个可行能力和工具性自由的框架[J]. 浙江社会科学, 2017(8): 72-85; 158.
- [17] Liang Z. China's great migration and the prospects of a more integrated society[J]. Th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16, 42(5): 276-293.
- [18] 阿马蒂亚·森. 以自由看待发展: 第一版[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 [19] 刘传江, 董廷芳. 农民工的代际分化、行为选择与市民化: 第一版[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3.
- [20] 王春光. 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J]. 社会学研究, 2006(5): 107-122; 244.
- [21] 李练军.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中小城镇的市民化能力研究——基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制度因素的考察[J]. 农业经济问题, 2015, 36(9): 46-53; 110-111.
- [22] 叶静怡, 王琼. 进城务工人员福利水平的一个评价——基于 Sen 的可行能力理论[J]. 经济学(季刊), 2014, 13(4): 1323-1344.
- [23] 高进云, 乔荣锋, 张安录. 农地城市流转前后农户福利变化的模糊评价——基于森的可行能力理论[J]. 管理世界, 2007(6): 45-55.
- [24] Martinetti E C, Roche J M. “Operationalization of the Capability Approach,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A Review of Techniques and Empirical Applications”, Debating Global Society: Reach and Limits of the Capability Approach[M]. Milan: Fondazione Feltrinelli, 2009.

责任编辑: 曾凡盛